

浙江文叢

吳師道集

〔上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吳師道集

〔上冊〕

〔元〕吳師道 著 邱居里 邢新欣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前言

吳師道是元代婺州地區的著名學者，在表彰北山朱學和重視史學與鄉邦文獻兩方面繼承了金華學術的優秀傳統。《吳師道集》彙集吳氏一生創作的詩文，是其人生交遊、思想學術與文學成就的真實總結。

一

吳師道（一二八三—一三四四），字正傳，江浙行省婺州路蘭溪州（今屬浙江）人。吳氏並非世代簪纓。高祖吳杞、曾祖吳輝都潛美不耀。至祖父吳儒宗始習舉子業，宋季補國子學，入元，以綱紀鄉學為務。伯父吳辛亦為宋國子待補生，元元貞、大德間曾任金華、仙居教諭。師道生父吳棨『隱約終身，務培植陰德而已』，並不是讀書人。然師道幼而穎異，祖父儒宗對其鍾愛有加，『脫襁褓，卧起飲食挾與俱。能言，口授以書，喜其可教。少長，課以詩賦，兼講經義』^{〔一〕}。並命師道過繼伯父吳辛為後，以繼承吳氏文脈。師道亦每念遺訓，為之感激激勵，問學疾力，不督而勤。師道始學，主要源出家學。然而吳氏家族並無深厚的儒學積澱，儒宗雖博通群經，所傳習仍只詩賦、經義，以應對科考而已。這也初步為師道奠定了善記覽、工詞章的

為學基礎。

延祐元年（一三二四），元朝恢復科舉。七年後，師道中至治元年（一三三一）進士，實現了吳氏家族三代以來由科舉晉身士族的殷殷期望。其後，他沉浮下僚近二十年，先後擔任高郵府高郵縣丞、寧國路錄事、池州路建德縣尹等地方官員。師道雖由儒學而出仕，為政卻並不懦弱無能。在高郵，他明達文法，吏不敢欺，曾修復決壞的漕渠。任寧國錄事，他捕殺肆行攘奪的諸路軍卒，安輯市人。天曆二年（一三二九），宣城大旱，師道攝行縣事，賑濟饑民三十餘萬。尹建德，他修復縣學，減輕茶稅，恢復池州路學田。凡所任皆有守有為，敢於任事，有愛民之聲。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元朝復興文治，揀選名儒入教國子。吳師道因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推薦，入朝為國子助教，次年陞博士，教授國子學凡三年。他講明經義，表彰理學，排斥異論，不稍假借，謹遵朱子之訓，一守國初許衡之成法。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師道丁憂歸。四年，因病乞休，朝命以禮部郎中致仕，命未下而師道已卒。

吳師道的著作，據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有《蘭陰山房類藁》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辨》十二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二〕}。《易雜說》、《書雜說》、《詩雜說》及《春秋胡氏傳附辨》今皆不傳。《敬鄉錄》傳世本僅十四卷，似已非完璧。此外，明清書目還著錄《吳禮部詩話》、《詞話》各一卷。

元代婺州，學術思想有著兩方面傳統，其一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等繼承的金華朱學，其二是呂祖謙開啓的東萊婺學。作為婺州的著名學者，吳師道亦在雙方面承襲了金華學術的優秀傳統。

表彰闡揚北山四先生的金華朱學，是吳師道傳承金華學術的一個突出特點。宋元之際，程朱理學在南方早已廣泛傳播，朱子高弟黃榦下傳的金華朱學已成為當時朱學的重要流派。北山何基、魯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先生都是婺州人，為婺州地區帶來濃郁的理學氛圍。與金履祥同里的吳師道，也必不可免受到朱學思想的濡染。弱冠，師道讀到西山先生真德秀《讀書記》，『慨然歎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於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適者，今則深可悔爾。』^{〔三〕}始有志於講求心性義理的為己之學。至大初年（一三〇八），吳氏聞許謙師從金履祥，得何基、王柏之學，而上溯朱子之傳，即作《與許益之書》，向許謙請教持敬致知之說^{〔四〕}。謙作《答吳正傳書》，以南宋李侗告朱子理一分殊之旨，勉勵他精脩力踐，涵泳從容^{〔五〕}。師道雖未及從學仁山，卻由此成為白雲學侶，以道義交約三十年，共同商榷經學，探討義理，唱和詩文，在學術思想上，留下金華朱學的深刻影響。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與點抹《儀禮注疏》，曾經同師道『相與反復論辨』，部分論說直接採錄師道之言^{〔六〕}。吳氏詩文集中，與許謙有關的近二十篇。師道撰有《易雜說》等經學著作多種，惜皆散佚，只能從其文集的相

關序文中，瞭解他的撰述主旨。是以後世所知吳師道對金華朱學的承傳，不在他的經學著述，而是他為表彰傳播北山之學所作的多方面努力。

師道曾上書元朝，請求於何基故居設立北山書院，表彰這位『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的金華朱學開創者。書中逐一列舉北山的理學著作，肯定其『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七〕}。吳氏還呈請有司，要求在蘭溪州學祭祠金履祥，尊崇其對金華朱學的繼承^{〔八〕}。

師道又代御史孫幹卿草擬公文，申請刊刻何基、許謙著作。公文稱頌『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於勉齋黃氏，得朱子的傳』，著作有《大學》、《中庸》、《易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等《發揮》。《大學》等五部《發揮》刊行已久，止有《近思錄發揮》未能完成。後經門人金履祥纂次訂定，已有全書。《近思錄》一書，是朱熹、呂祖謙選編的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四位理學奠基者的言論集，在理學發展史上具有『近世一經』的重要地位。而何基的『《發揮》之旨尤為精詳』，並用朱子本旨，不雜他說，『非泛泛他書之比』。此外，學承金履祥的許謙，作為金華朱學的第四代傳人，『紹述宗旨，從遊甚衆』。其著作《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惜尚未刊刻，『四方傳錄，多以未見為恨』。因此，請求在婺州路儒學刊版流布三書，以嘉惠後學，有補教化^{〔九〕}。

師道復應許謙門人之請，為《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二書作序，而於《叢說》表彰

尤力。《四書》之學，本是程朱理學的基石與核心。『《四書》得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朱門後學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或泯沒就微，或畔渙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金華朱學四先生。而且，『但熟讀《四書》』，又是昔日北山師從黃榦於臨川，臨別時授受的師訓。所以，四先生於《四書》之學，守為家法，用功惟勤。『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者，《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併載之。』至于許謙的《讀四書叢說》，更是羽翼《四書章句集注》的功臣。『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之標的歟！』^[10]

至正元年，吳師道出任國子博士，再次呈文朝廷，請求在國學傳習許謙標點的《四書章句集注》等經典。呈文首先引先儒之言，辨明章句標點並非無關宏旨：『昔人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爾。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辭說，牽補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進而指出，標抹點書之法，始自南宋呂祖謙，而由四先生承其緒。何氏、王柏有《四書》及《通鑒綱目》點本，弟子金履祥、張璠又祖述何、王。近時許謙『重點《四書章句集注》，及以廖氏九經校本再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併注，《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

氏《傳》、朱子《家禮》，皆有點本，分別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訛謬，標釋段畫，辭不費而義明』，《真適道之指南也》。所以師道『特為申明，轉聞上司，委通經之士親賁善本，就其家傳錄，併廣及呂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官，嘉惠後進』，藉以改變舊日國學中師異旨殊、不無乖舛的混亂局面，進一步擴大金華朱學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影響^{〔一〕}。

師道還致書史局，總結何基、王柏的生平學術。元順帝至正三年，詔修宋、遼、金三史，吳師道節錄何基、王柏行實，寄呈史局諸公，為《宋史》二人傳記提供原始資料。《節錄》不但記載何基、王柏的生平為人和治學經歷，且詳錄兩位傳主的著述、卷帙、刊刻流傳，尤其強調金華之學得朱子正傳的理學統緒，更用大量篇幅摘錄二先生治學及對《五經》、《四書》的論學要語。因此，這篇洋洋三千五百言的《節錄》，既是何基、王柏的個人傳記，更重在總結二先生的思想學術，帶有濃厚的學術史特色^{〔二〕}。元修《宋史》，《儒林傳》即節取吳氏的《節錄》而作何基、王柏二傳^{〔三〕}。《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的《何基傳》及《何文定語》，完全依據《節錄》，未有任何增益，甚至其後黃宗羲的按語，亦摘錄吳文而成。《王柏傳》與《魯齋要語》，也是以《節錄》為基礎，增補若干資料而成^{〔四〕}。由于何基、王柏的行實後世不傳，吳師道的《節錄》成為後世記述何基、王柏生平學術的最基本史料。

清人黃百家《北山四先生學案》案語稱：『白雲非得子長（張樞）、正傳（吳師道），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五〕}表彰了吳師道闡揚金華朱學的重要作用。

重視史學與文獻之學，是吳師道傳承金華學術的又一特點。金華自宋室南渡，就是文化發達、人才薈萃之地。東萊呂祖謙開啓婺學，與朱熹閩學、陸九淵江西之學鼎足而立，成為乾道、淳熙之後南宋的三大學派之一。婺學雖『以性學紹道統』^{〔一六〕}，卻兼承呂氏家學的『中原文獻之傳』^{〔一七〕}，講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八〕}。其特點，一是注重史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一九〕}，二是留意考察古今文獻，藉助對歷史與文獻的研習，涵養道德心性。受東萊婺學的熏習，吳師道學術也兼有重視史學與文獻之學的特色。

吳氏關注史學，在詩文集中有大量反映。卷十雜著，有《三國志雜論》、《讀左傳並注數事》、《秦隋論》等系列史論；詩集中，有懷古、詠史的專題詩作；卷十九策問，有關於古代學術與禮樂刑政制度的系統國學策問；卷十六至十八題跋中，也有關於漢史、五代史、南宋史的多篇跋文。當然，師道在史學領域最重要的工作，還是作《戰國策校注》十卷，補正鮑彪的《戰國策注》。《戰國策》文字訛舛，號為難讀，自西漢劉向校書，即已病之。北宋曾鞏再校，亦加致疑。東漢高誘作《戰國策注》。南宋括蒼鮑彪以高注疎略謬妄，于是改定次第，補正脫誤，又時出己論，更為之注。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依據孫朴校本，薈萃諸家，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吳師道認為，姚氏注因高誘注而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而鮑氏注儘管有分次章條、詳述注說的優點，然率意竄改，謬妄乖誤，不容不正。師道于是取姚宏注與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證，並以呂祖謙《大事記》質正是非，以『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體例

上，師道一仍鮑注篇章次序，而在每條之下，分別以『補曰』增其所闕，『正曰』糾其所失；至於鮑注謬誤之處，則直接抹去。師道特地在卷首保存了劉向、曾鞏校定的《戰國策》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舊次第，以與校注中已經為鮑彪更改的篇章次序相對照。卷後又附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諸家跋語，及姚宏、姚寬、耿延禧三序，以便讀者瞭解其書的本末源流。師道復作《戰國策校注自序》二首，其一系統探討鮑彪《戰國策注》的缺失，提出其專據《史記》、引書寡陋、徑改本文、強為傳會、史事錯訛、論說謬誤等六方面的諸多問題；其二，肯定《戰國策》作為一部記述戰國歷史的先秦典籍，雖沒有《春秋》寓褒貶以示大訓的聖人之心，而且善惡兼書，無所是非，言語誇張，記載失實，卻仍然具有『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的史學價值以及警戒君子、懲創小人的道德價值^{〔一〇〕}。《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吳氏對鮑注的批評『議論皆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一一〕}。給予《戰國策校注》很高的評價。

文獻的考補訂正，也是《吳師道集》的重要內容。在經學典籍之外，吳氏對《太玄》、《潛虛》、《古三墳書》、《靈棋經》、《道源文獻錄》、《荀子》、《揚子》、《文中子》、《子華子》、《甲乙集》、《讒書》、《鳳髓集》等文獻都有所考訂，長達二千五百言的《題家藏淵明集後》，更是對《陶淵明集》的考釋之作，他還曾與許謙共同補正元趙仁舉的《絳守居園池記注》。不過，師道的文獻之學，最為關注的還是鄉邦文獻的輯錄與整理。師道幼年隨侍祖父吳儒宗，『及見故時遺

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三三〕}。成年後，有感於斯文淪喪，衣冠道消，而文獻故藏，又殘闕散佚，或燬於火，即立志輯錄整理先賢文獻。他曾在鄉校堂試中專題策問諸生先賢詩文事跡，竟無有能言之者^{〔三四〕}，因而慨歎云：『前修既遠，緒論寢微，晚學之所深恨。』^{〔三五〕}因此，師道對鄉先賢的事跡、詩文、刻石等都著意搜求，並親自輯錄或協助編次了金伯孫、于石、時少章、范浚等鄉賢詩文集。元統二、三年（一三三四—一三三五），師道為生父服喪里居，即取家藏鄉先生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曰《敬鄉錄》。吳氏自序云：蘭溪由漢迄宋，上下千數百年，其間多有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僂佛之徒居半，則記載缺略可知。宋室南渡後，蘭溪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什伯於前，碩儒才士，相望輩出，而入元以來未有紀者，再數十年，勢必淪喪殆絕^{〔三六〕}。至于婺州，宋紹興二十四年，婺守洪遵修《東陽志》。然紀錄當代人物僅僅數人，闕遺固多。且最後《事類》一卷，悉錄裨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尤詳略失當。何況南宋以來，婺州材賢名卿，肩摩踵接，不可勝數。尤其是呂祖謙『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世』；何基、王柏『又紹紫陽之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因此，師道『愚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三六〕}。根據兩篇自序，《敬鄉錄》原分為前、後二錄，《前錄》專輯蘭溪先賢，《後錄》則收存範圍擴及婺州路。著錄時間上自蕭梁，下迄宋末。體例是每人先次其生平行略，再附錄所著詩文；亦有止存篇目，不錄詩文者。《四庫全書總目》曰，金華代出碩儒，師道《敬鄉錄》收錄博

要，又在元代以前，文獻流傳，尤可貴惜。而且其書『編輯宋人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記載多有異同』，可資考證^{〔二七〕}。贊揚師道《敬鄉錄》於鄉邦文獻留存與史事考訂都有裨益。

吳師道早年留心記覽，刻意詞章，又與黃潛、柳貫等名家迭相唱和，黃潛稱其『才思湧溢，亶亶不已，時出為詩歌，清麗俊逸，人多誦稱之』^{〔二八〕}。晚年益致力於文章，陳旅評其文風『紆徐委折，含蓄思致』，意境深邃^{〔二九〕}。《四庫全書總目》亦推崇師道詩文具有法度，可『哀然升作者之堂』，『與講學家以餘力及之者迥不同耳』^{〔三〇〕}。而吳氏文章的主旨，則多在推明紫陽朱子之學。黃百家《北山學案》案語，將雙峰饒魯與北山何基這兩支朱學高弟黃榦的學傳相比較，

指出饒魯後學雖也有錚錚一時者，然再傳即衰微不振。而北山一派，非但王柏、金履祥、許謙『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且柳貫、吳師道等後學又能『得朱子之文瀾』，所以，『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充分肯定了師道接續北山學統、以文章羽翼朱學的功績^{〔三一〕}。可以說，吳師道的詩文集，在學術史和文學史上，皆有其價值。

三

《吳師道集》原名《蘭陰山房類稿》，凡詩九卷，文十一卷，《附錄》一卷，收有元張樞撰《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杜本撰《墓誌銘》二文，是至正四年師道卒後，其次子吳沉所編。至正六年九月，友人黃潛作序，稱《吳正傳先生文集》，是以師道之字題名。至正中刊板行世，改題

《吳禮部文集》，則因其致仕時元朝授其為禮部郎中，而以官名集。元刊本版式為半頁十六行，行二十字，卷前附有《吳先生小像》及《蘭陰山人自贊》。清代元刊尚有孤本存世。嘉慶三年（一七九八），長洲藏書家黃丕烈購得曾經清初季振宜收存的至正本《吳禮部文集》，作《題識》一則，指出當時該本已有闕佚，卷首序文脫落，卷十四亦缺第十八頁，然無他本可補^{〔三二〕}。黃氏藏本後經汪士鍾藝芸書舍流入陸心源皕宋樓，陸氏為作跋文二則，統計是集收錄詩文「共九百六十首」，比全本僅差兩首，說明元刊本殘佚尚少^{〔三三〕}。其後，陸氏藏書由心源之子售往日本，收藏於《靜嘉堂文庫》，元刊本《吳禮部文集》國內遂不復存。

《吳師道集》在明、清兩代未嘗重印再版，多以抄本流傳。除清修《四庫全書》諸抄本外，大陸今存清抄本《吳禮部文集》五部，分藏國家圖書館（二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據《四庫全書總目》，師道集在清初「流傳頗鮮，此本（《四庫》底本）乃新城王士禎寫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於世」^{〔三四〕}。即吳集傳本鮮少，清前期行世者皆源自新城王士禎抄本，而王本又是抄自崑山徐秉義家藏，《四庫》本《禮部集》亦來源於此。檢徐秉義《培林堂書目》，集部著錄『《吳師道集》二十卷，一冊。又抄一冊』^{〔三五〕}。說明徐氏確實藏有元刊本，又另有抄本一冊，成為清代傳世諸抄本之源。黃丕烈所得元刊本，曾是季振宜家藏。季為江蘇泰興人，清初著名藏書家，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進士，知浙江蘭溪縣。而蘭溪正是吳師道的故鄉，季氏的元刊本《吳禮部文集》，應是得之於此。季氏後入京，順治末年任浙江

道御史，其書也應隨季氏入京，輾轉至順康間烜赫一時的崑山徐氏三兄弟家。徐秉義晚年休致回鄉，而崑山、長洲同屬蘇州府，黃丕烈《題識》云元刊本是郡城故家物，所指或許就是徐氏。黃丕烈《題識》根據《四庫總目》所言傳本來源以及元刊本中有夾籤，確定其應為傳錄者竄改之處；元刊本序文脫落，清抄本亦無黃潛序，而取《元史·吳師道傳》抄於卷首作為序言等情況，首次提出清代傳世諸抄本《吳禮部文集》，即是出自這一曾經季振宜、徐秉義收藏，又歸於黃丕烈的已有闕佚的元刊本。

然而，清代尚存的這部元刊孤本脫文有限，僅闕序言與卷十四的第十八頁，而包括《四庫》本在內的諸清抄本《吳禮部文集》卻殘佚嚴重。國家圖書館今藏清初抄本《吳禮部文集》一部〔三六〕，其中各卷脫殘詩文達十九首，篇中脫簡甚或缺頁尚不計入，且抄寫極為草率，錯訛衍奪，字跡漫漶，多不可辨識。《四庫全書》據兩淮鹽政采進本收錄《禮部集》，殘佚詩文與前本完全相同，而且前本脫誤模糊之處，《四庫》本往往據文意補改，應該是據前本流傳之抄本收錄〔三七〕。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永康胡宗楙夢選樓輯刊《續金華叢書》，以清八千卷樓丁丙抄贈本為底本刊刻《吳禮部文集》，這是師道集的第二次刊版行世。丁丙本原在卷一、卷二、卷十一、卷十二、卷十四後各附《補遺》，收錄該卷脫落詩文，《金華》本據之不變；又以他校調正卷十四《送梁仲庸御史序》以下六篇前後屢亂的篇頁，並借張金吾愛日精廬抄本校訂文字訛誤，卷首則據黃潛《文獻集》補入《吳正傳文集序》，比之傳世各家清抄本，內容已略完備。丁丙本

《補遺》共收錄詩文十八篇，應是原抄本闕失、後據別本補抄的脫文，其篇目與國圖清初抄本、文淵閣《四庫》本基本相同^{〔三八〕}。又據《金華》本胡宗楙跋，張氏愛日精廬抄本各卷無《補遺》，較丁丙本少十數首^{〔三九〕}。這說明，包括《四庫》本在內的所有清抄本都殘佚嚴重，似非出於徐秉義收藏的脫文較少的元刊本，而應是傳錄自有同樣脫文的國圖藏清初抄本。前引《培林堂書目》，徐氏在元刊本外，恰恰另藏有抄本一部。這部抄本，方應是『王士禎寫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於世』的衆多清抄本之源。

《吳師道集》的傳世本，尚有明抄本一部。一九三〇年，藏書家傅增湘在北京文祿堂書鋪得見明抄本《吳正傳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遂以明抄本逐字對勘《續金華叢書》本《吳禮部文集》，先後寫下校跋四篇^{〔四〇〕}。根據傅增湘考察，明抄本藍格，綿紙，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卷十七後有『侍書洪壽錄』小字一行，當是抄錄者的題名。抄本首尾完具，卷首雖無元刊本所有的《吳先生小像》及《蘭陰山人自贊》，却完整保存了『至正六年九月甲申烏傷黃潛序』。卷末附錄《墓表》、《墓誌銘》後，又據《元史》補抄吳師道本傳一篇，亦與元刊本相同。更重要的是，明抄本二十卷篇目完整，未有闕文，不僅比殘佚嚴重的各家清抄本、《四庫》本優越，較補遺脫文的《續金華叢書》本亦多《憶知賦》一篇。同時，《金華》本脫落詩文附存於各卷之後的《補遺》，而明抄本則詩文咸列於卷中，篇目次第非常準確。在文字上，傅氏亦據明抄本校訂《金華》本訛舛，改正增補凡一千六百餘字。此外，明抄本在版本流傳上也是別有所自。

據該本之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杜楚題跋、甲戌年偶影居士跋及藏書圖記，明抄本在康熙十七年原為吳氏裔孫吳貞源藏書，壬申年由偶影居士購存，居士曾從師道後人吳勛借所藏家稿校過，在抄本中留下大量校字。其後，該本經邵晉涵、沈復燦鳴野山房、楊鼎重遠書樓、王文進文祿堂等遞藏，在版本源流上，較出自崑山徐氏的各家清抄本及《續金華叢書》本都更為可靠。因此，明抄本不惟版本來源最為可信，而且內容更加完整，篇目次第更為準確，文字訛誤也較少，故其價值不獨在各清抄本之上，也在《續金華叢書》本之上，是傳世諸本中最為完備精善者。明抄本《吳正傳先生文集》今藏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由於它的文獻價值，一九七〇年該館將之影印出版，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使之流傳。

四

由於元刊本《吳禮部文集》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所以本書的校點整理，選取傳世諸本中時間最早也最完善的明抄本《吳正傳先生文集》為底本（《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影印明抄本，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九七〇年版），而以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清初抄本《吳禮部文集》（簡稱清抄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禮部集》（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影印本，簡稱四庫本）、《續金華叢書》本《吳禮部文集》（永康胡宗楙夢選樓一九二四年刊本，簡稱金華本）三種版本為通校本。明抄本在傳世本中雖最為完整精善，但抄錄中仍難免有錯頁與脫漏。如卷九

《吳城山阻風》至《贈醫者陸生》等九詩，誤插入其後《正月六日七日舟中即事二首》一詩的詩題與詩文之間，將其詩分為兩處，本書即據各校本調整了順序。又如，卷十二《復始齋記》、《北山後遊記》，卷十三《戰國策校注序》，卷十四《贈黃伯庸序》，卷十七《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題家藏淵明集後》等文，各有脫行或脫句；卷十九《國學策問四十道》，脫抄篇題：本書均據各校本補正，並出校勘記予以說明。

本書在原集之外，還補充了《集外文》與《文集題跋》兩部分。《集外文》四篇，是自清嘉慶五年《蘭谿縣志》和《式古堂書畫彙考》中，輯錄的未曾收入文集的吳師道文章。而《文集題跋》，則彙輯後人關於《吳師道集》的題識跋語，包括元刊本五篇、明抄本八篇、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三六二三號）一篇、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三五四號）一篇、四庫本一篇、《續金華叢書》本二篇，以方便讀者對《吳師道集》版本、流傳情況的瞭解。

本書的校點整理是我與邢新欣同學共同承擔，而由我總其成，所以，書中的一切問題均應由我負責。本書的詩文體裁問題，曾承教於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璐先生，編輯出版，得益於吉林文史出版社張雪霜女士的熱忱工作；底本資料與題跋輯錄，分別得到朱冶同學和李開升同學的熱情幫助；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邱居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